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5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陈开科 著

巴拉第 的汉学研究

學苑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巴拉第的汉学研究

印章篆刻：郑怀宝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2909-2



9 787507 729092 >

定价：42.00元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陈开科 著

巴拉第 的汉学研究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拉第的汉学研究/陈开科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7. 8

(列国汉学史书系)

ISBN 978 - 7 - 5077 - 2909 - 2

I. 巴… II. 陈… III. 汉学—研究 IV. K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4314 号

责任编辑:杨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yg@sina. com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刷厂:河北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5×960 16

印 张:20.37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07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2500册

定 价:42.00元

前 言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于世界汉学之林独树一帜,它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内容。

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始于18世纪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其主要介体就是“布道团”。根据《恰克图条约》,俄罗斯轻而易举获得了向北京派遣“布道团”的权力。这个“布道团”绝不是满清政府当初所认识的那样,是纯粹的仅仅局限于小范围的宗教活动团体。从它后来的行为看,它实际上是并非使节的使节。由各个时期沙俄各职能部门给“布道团”下达的指令就可以知道,“布道团”的任务就是利用各种方式包括汉学研究、实地考察以及收集掠夺等为沙俄的侵略政策服务。也因此,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无意中成为俄罗斯汉学的萌芽基地。而且,正如我在正文中所论述的,沙俄时代的俄罗斯汉学在结构上存在并行的两个体系即北京布道团汉学体系(北京)和俄罗斯世俗汉学体系(圣彼得堡),19世纪中叶及以前,俄罗斯汉学的重心乃在北京布道团。历史地看,俄罗斯汉学走过了一条相对成熟的道路,从初期的游记、日记、报告等萌芽态汉学(17-18世纪初),到中期以资料译注和初步研究为特征的过渡态汉学(18、19世纪中叶),以及后期的研究、译注成熟态汉学(19世纪中叶后)。本书的主人公巴拉第既是俄罗斯北京布道团汉学体系的灵魂人物,又是俄罗斯汉学成熟态时期的代表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巴拉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达31年,并且恰逢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重大政治变动时期,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外交、文化和经贸三重职能在他身上得到了最透彻的实践。可以说,巴拉第是19世纪中叶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研究他,对于丰富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内容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是,客观地说,研究巴拉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一,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此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早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尚不尽人意,以致早期中俄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自然就相当薄弱,而对中

俄文化交流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的俄罗斯汉学的研究则可以说还刚刚起步,具体涉及到巴拉第汉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如凤毛麟角,因此,很少有详尽的个案研究可供参考。要研究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就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自行探索。

其次,资料上有难度。照我个人的看法,为了克服从文本到文本的静态研究的弊病,我们必须详尽占有巴拉第汉学生涯的相关档案资料,从而通过这些资料走进汉学家的心灵。但这些档案资料四散分布,很难寻找,就算找到了,也有很多是手稿。比如信件和报告,已经整理出版的仅仅是极少数,大多数都以手稿的形式收藏。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手稿大都已经漫漶不清,难于辨认。寻找、阅读和理解都存在一定的难度。

其三,巴拉第百科全书式的汉学著述,读来令人畏难。理论上,我历来主张要研究某个海外汉学家的汉学研究,原则之一就是必须要细致全面地研读完汉学家的所有汉学著述。但是,如果遇到巴拉第这样的汉学家,那实践这种原则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由于巴拉第学识的“百科全书”性质,他的汉学研究所涉并非某一种专门史,而是涉及到元史、中国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研究)、地理和考古学、词典学、以及早期中俄外交与经贸关系等诸多领域,叫人眼花缭乱。而内容如此复杂的汉学研究,不仅对研究者的语言功夫是一个考验,而且对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学术能力也是一个考验。

尽管有相当难度,一路行来,战战兢兢,汗出如浆,但总算将“巴拉第的汉学研究”这个堡垒的大门打开了。不敢说尽窥其中的秘藏,至少给后人进一步研究做了铺垫。可以说,《巴拉第的汉学研究》的杀青既圆了自己的梦,又遂了导师蔡鸿生教授的心愿。就我个人来说,因为有留学俄罗斯的经历,所以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对俄罗斯汉学做些个案研究。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巴拉第的汉学研究》,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俄罗斯情结。至于蔡先生,是我在博士后研究时期的合作导师。出于史学家的敏感,蔡先生一直对巴拉第情有独钟。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之所以与巴拉第有关,是和蔡先生的建议分不开的。蔡先生所著《俄罗斯馆纪事》曾在很多地方提到巴拉第,并对巴拉第汉学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界定。在某种意义上,摆在面前的这本《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可以说是蔡先生有

关巴拉第的学术思想断想的延展。

最后,需要郑重说明的是,由于本人学识浅陋,更由于所涉问题复杂、宽泛,而且,作为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个案研究,此前并无样本可供参考,因此,错误以及种种不成熟在所难免,谨希望诸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幸甚矣!

序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开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多方而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外。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周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而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让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而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而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的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 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

① 严绍疆:《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载 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 ~ 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 ~ 1978),他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

^① 季羨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中华书局,2003年。

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认识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特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1921年10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他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掏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本质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

^① 《章太炎全集·〈冠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上原始论〉》。

物。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和Serice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Sericum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10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522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三页,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版。

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7次,历经28年,到过30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851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鞞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

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到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神秘感就从那时开始。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u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